



社会的剧变

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

库马博士 著

蔡仲章 译

库马博士著
蔡伸章译

社会的剧变

——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

志文出版社

社會的劇變

新潮文庫 290

原 著 者	庫 馬 博 士
譯 者	蔡 伸 章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1號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 三 號
電 話	8719141・8719151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二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 0950 號
法 律 顧 問	林 金 發 律 師

定價170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目 錄

原序	一
譯者的話	七
第一章 新世界	一七
一、進步之意理	一七
二、聖西蒙：社會的科學與科學的社會	三二
第二章 時代的鉅變	五三
一、革命的神話	五四
二、社會學與工業社會	六四
第三章 革命的定義：工業主義的形象	七六
一、都市主義的生活方式	七九
二、人口的變遷	八九
三、社區的衰落	九四

四、專業化與分工·····	九
五、集權化、平等化與民主化·····	一〇六
六、世俗化、理性化與官僚化·····	一一五
第四章 革命的剖析：形象與實體 ·····	一三二
一、工業化的模式與社會的變遷·····	一三七
二、時間與節奏·····	一五五
三、工業社會的未來·····	一七五
第五章 工業主義的高潮 ·····	一九三
一、終止感·····	一九四
二、復元與前進·····	二〇一
第六章 後工業社會？ ·····	二一九
一、未來的再發現·····	二二〇
二、新社會的形象·····	二二八
三、服務性經濟·····	二四〇
四、白領階級工作·····	二四四
五、專業化·····	二五三

六、知識的爆炸·····	二六五
七、持續與變遷·····	二七九
第七章 社會發展的連續與斷絕·····	二八九
一、再訪服務性社會·····	二九一
二、烏托邦主義的關聯性·····	三一二
三、困境與超越·····	三二八
第八章 進步與工業主義·····	三七三
一、過去、現在與未來——進步的辯證性·····	三七三
二、未來中的過去·····	三九〇
本書參考書目·····	四〇九
中英文名詞索引·····	四五七

原序

本書或許由於它所探索的主題的關係，幾乎無可避免地深受近代知識與政治歷史所影響。先就知識方面來說吧。我的同事巴爾先生（Ray Pahl）知道我個人對社會變遷理論一向懷有高度的興趣，由於他的建議，我乃在一九七二年某時，開始探索——新近重開探索風氣的——有關未來工業社會的主題。

使我大感驚異的是，我發現我個人的興趣竟使我置身於一個充斥着——「未來展望」、「平實的預測」（Surprise-free projections）、「達非預測中心」（Delphi forecasting）、「公元二〇〇〇年願委會」（Commissions on the Year 2000），以及層出不窮的未來學研究機構的——一個「確信不疑的世界」。我當初的希望是，或許我可以將我個人對科幻小說的愛好，跟較為審慎的「學術生涯」結合起來，但不幸事與願違，不久之後，我便徹底感到失望。我發現到，即使是最通俗的科幻小說作家，亦比我一向孜孜研究的技術官僚性，充滿着冷僻專門用語的願委會報告，「智囊團預測」，以及社會預測所透露的東西，更具有想像力及洞見力。如果我們果真面對着「未來的衝擊」的話，那麼我認為，有關未來最具衝擊力的東西似乎是它的「平凡無奇」，以及它的「令人厭倦」。其後問世的無數的「公元二〇〇〇年的人類」及「公元二〇〇〇年計劃」，更使我確認，以一本鉅幅的專書去探討未來學的現象，將是徒勞無益的。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祇會令人感到氣餒而已。

所幸，還有一個例外。不久以前，我偶然發現到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及其「後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 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理論。我認為，他所提出的此種理論確有許多「合理而又可信之處」，它似乎頗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判。在我個人所觸及的有關未來學文獻裏，它比其他未來研究更具知識上的膽識與堅韌。

他毫不含糊的表示，工業社會已日益「離棄」它十九世紀的基盤。我們必須以完全不同於承自傳統工業主義理論的「知識概念」，去汲取它現有的素材，及思索它的未來（亦即工業主義的未來）。此種觀點，無可否認地，有其特別吸引人之處——因為它十分明確而有意地關聯於工業主義的古典社會學理論。事實上，它大部份的力量係「依恃」於它跟古典工業主義分析的對比，以及它們所含攝的歷史。

而此正意味着，我們「探測的型態」。後工業社會的理念——作為評估工業主義價值的一個基要步驟——正足以指引工業社會的研究者，返諸該社會的歷史性過去，從而對其起源與進化，從事理論化的「再型構」。

如果我們果真正邁入一個「後工社會」的話，那麼後工社會正行取代的「工業社會」究竟是什麼呢？而工業社會與後工社會的尖銳區別，究竟何在呢？工業社會的結構與發展的原則究竟是什麼呢？而它們在過去兩百年的進程中，是如何改變的呢？特別值得探討的是，上世紀的歐洲大社會學家——聖西蒙、馬克思、托克維爾、韋伯、涂爾幹——是如何構思他們親眼所目睹的——正在形成中的新社會呢？很明顯地，所謂「後工理論」，大體上係建構在這些大人物的思想上，就某一方面來說，後工理論矢志為二十世紀後期所從事的探究，正如同上世紀的社會學大師為十九世紀所作的診斷一樣，亦即，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社會，塑造一個足以服人的「識見」或「形

象」。

個人以爲，後工理念的最大影響力很可能是出自——十九世紀社會學大師們曾作出重大貢獻的——「工業主義形象」之對比，而較少受啓於真正的歷史。因此，爲求作進一步的分析，我們必得將「工業主義的形象」與「時代的歷史性發展」，作一對比。追根究底、窮本溯源，從事這方面探究的最有效方法乃是，將後工社會的形象與工業社會的形象，作一相對的闡述，如此，我們才能明瞭兩者（後工社會與工業社會之形象），皆建基於一種知識的傳統上，此一知識傳統會產生了一種有關工業社會史的特殊識見，雖然有時它是一種嚴重歪曲的識見。爲求更正確地認識我們當前的處境，我們必須先行去界定及剖析此種傳統。

爲求其一貫性起見，在此種傳統的開端，我首先提到聖西蒙這個人——他可以稱得上是工業社會的第一位先知。聖西蒙的思想「分跨」了十八世紀的啓蒙進步觀念及十九世紀的工業主義理念。他工業主義的社會學明確地將「進步」與「工業社會」聯結在一起：進步的理念係在求其實現，而最後則達於工業社會的建立。其後的社會學家皆承繼此種理念的「融合」，雖然他們對此種理念的信仰，程度各有不同。

爲了窮究工業社會的社會學，我乃試行去追溯進步理念的各色各類的「財富」——上至工業主義的起源，下達於當代「後工業主義」(Post-industrialism)理念的具現。

此外，進步的理念亦爲這些主題之間，提供一座橋樑，這些主題乃是本書的主要題材，而其理念則在本書最後兩章加以發揮。我必須在此表明，激發這方面研究的熱潮，主要係出於當前的「知識潮流」。正當我開始認真地撰寫此書之後不久，我們這時代的政治史正好發生了鉅變。在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間，產油國提高四倍油價的行動，主要的工業系統，乃至全世界，皆被「能

源危機」所驚醒了。

當然，有少數有識之士——例如舒馬赫 (E. F. Schumacher) 便是其中之一——早在能源危機發生以前，即發出嚴重的警告。但是，主要還是那年冬季的戲劇性事件，才使舉世意識到能源問題的迫切性，也因為此一事件，才使工業系統對燃料與天然資源的依賴改變態度。現今，一般已普遍認識到，石化燃料與天然資源是有限的、一用即盡的，而且它們在全球的分配上亦極不公平。

繼之，全球所有工業國家，對工業社會的當前狀況與未來前進，展開激烈而富有教育意義的辯論。英國泰晤士報的讀者投書欄，幾個月裏每天皆出現相當令人側目的高見。而以「知識的敏銳性」為特色的「紐約書評雜誌」，亦曾就資源與技術有關問題，刊載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較出色的撰稿人包括愛瑪·羅斯奇 (Emma Rothschild) 及巴克勞 (Geoffrey Barclough) 諸人。從這些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能源危機」已被視為是工業社會更嚴重危機的一種先兆。在這股風潮之下，一九四五年之後滿懷信心的「進步主義」已頓時被遏止。焦慮與不安的氣息已向後延伸到——令人懷疑迄至現時為止的工業社會的整個「發展模式」是否已出了差錯。有些人宣稱「碳氫化合物時代的結束」，有些人甚且聲稱「工業主義已告結束」而「小的」（指小型產業）又再度被發現是「美的」。

處此燃眉之急，有關研究機構自不得不認真注意，以其他「可再生能源」，諸如日光、海水及風力等以供應動力的「替代技術形式」。過去兩百年來所形成的整盤工作結構與官僚組織，已被確認為「再檢視」的必要。一些深思熟慮之士斷然認定，至少，建立在工業社會發展型態的某

些「基本假設」，現在已呈現不穩。快速而持續不斷的經濟成長即為其中之一。從事某種基本性的「再調適」(readjustment)，在方向上作適度的轉變，似乎是極其必要且刻不容緩的。

這些年來，我個人的思緒無疑深受此種「新風潮」的影響，但我必須坦白聲明，無論如何，我個人早亦有此傾向。「後工理念」現在已更堅實地被確認為一種特異成長與富裕的「新紀元」之產物（但是我個人絕不認為，僅因此端，即可武斷地否定它的價值，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市場自由競爭時代的結束，而斷然排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一樣）。事實上，它可能是最後，但絕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基本上仍以古典工業主義的用語來表達的工業社會理論。

最後，我覺得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未來社會不是丹尼爾·貝爾所預斷的後工業社會的話，那麼情形將會如何呢？我們還可想像到其他什麼發展路線呢？而在廿世紀後卅年中，正行出現的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呢？本書最後兩章將對這個問題提供某些「思路」。當然，它們全是十分初淺且僅是試探性的，而且其中有些「思路」幾乎可說是異想天開的幻想。但無論如何，個人總覺得，我們多少必須在這個方向上投下一番心血，期使有關工業社會的理論與實踐之闡述，更臻完備。

庫馬於英格蘭·坎特培里

譯者的話

近年來，有關工業昇級、科技發展方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的建立、資訊工業的開發……乃至於人口膨脹問題、都市化問題、生態與環境問題、社區規劃問題、消費者保護問題、工業公害問題、日趨工商化所引致的社會問題……乃至於生活品質問題，已日益受到國人的重視。而有些政論圈亦曾針對現代化問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中華傳統的現代化問題……甚至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問題……展開一些極其膚淺的辯論。

筆者以為，上述繁多而複雜的問題無一不與兩百年來的世界工業化問題有關。筆者感到好奇的是，這些喜作驚人之語，好逞口舌之快的「半文盲」，對這兩百年來的工業化進程、它在世界各地所造成衝擊的程度……乃至它對社會結構、人口問題、生活型態、階級形成、政治局面、意識型態、種族問題、民族主義問題、政治制度、法律規章、價值觀……以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個人與羣體的關係……產生的影響如何，究竟有多少瞭解。

在這種情形下，毋怪乎這一波又一波的「意氣論戰」，每每在論戰雙方皆耗盡「腦庫」——但已洩過「情緒」之後——便告無疾而終。

對這批「盲人瞎馬」的開路先鋒與時代猛將，我們當然不敢寄予厚望。

然而，追根究底，這類「老K對小K」式的混戰是有其「時空背景」的——亦即臺灣式的染缸。有人謔稱臺灣文化為「雜牌文化」或「雜種文化」，應注意的是，這個「雜種」——不是混血而來的——而是「亂交」的產物。此種雜種文化——因即時行樂的亂交而形成的「怪胎」——

的最大特色是，圖一時之爽，而不知百年大計，以致於目光如豆，見樹不見林……。我們的政治系統、經濟制度、工商企業……乃至社會風氣、人際關係、生活樣式、文化出版、學術研究……以及所謂的「黨外活動」莫不皆然。在這種時空背景下，看任何問題，既乏歷史的反省力，亦無現階段的批判力，對未來自然會感到前途茫茫——如此，我們如何培養出一貫的透視力呢？以學術界來說，什麼東西都有人搞，但搞的全是Model，什麼旁門左道都去鑽，就是不敢碰理論。學經濟的，不是搞「貨幣神仙論」，便是搞「計量萬能論」……而對經濟理論、經濟史觀……「經濟人類學」之類的基礎性東西，却少有人肯去探究。學法律的，什麼鑽牛角尖（最好能賺到錢）的東西，都有人鑽，就是不肯研究法理。學社會學的，不是勞資糾紛，就是社會工作……人口統計、「社會變遷」（在臺灣，所謂的社會變遷論，好像是江山樓與寶斗里的風水輪替論），而對社會學的下層建築却鮮有人去觸及。學醫的，除了自嘆不如王永慶之外，開刀每不忘索紅包，其醫德之賤，如跟獸醫相比，可謂差以千里。由這類貨色在扮演臺灣的文化要角，你不難想像，臺灣的雜種文化會「突變」成什麼樣子？

經濟史學家羅斯托（W. W. Rostow）在其『經濟成長七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裏，曾謂工業化係起自「國恥」（national humiliation）的反抗。這種說法至少對一八六七年的日本明治維新來說，是極其恰當的。因為，日本之迅速邁向工業化，部份原因無可否認地是由其文化傳統的恥感所逼出來的。再加上人口與面積的經濟規模，頗有利於本土的迅速工業化，因此日本乃能成功而較少痛苦地，將西方工業文明納入其本土的文化架構之內。

而中國這個古老帝國，對西方工業化的入侵，究竟採取怎樣的反應態度與行動呢？或許，這個問題可以「老羞成怒」這四個字來概括。當西潮襲入中土時，滿大人們並沒有覺醒到時代的鉅變；對於西方列強的船堅砲利，中國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對於西方的政經制度，中國則嗤之以鼻；對於西方意識型態的挑戰，中國則出以自我膨脹的民族主義來搪塞。對於西方工業化的來龍去脈，亦鮮有去探討與思考。這種關起門來做皇帝的民族情緒，使國人不去瞭解西方強勢文化的特質，又令國人昧於自身危機的處境，而當帝國主義的強制力以排山倒海之勢，大舉撲向東來時，終使國人被捲席其間，而手足無措。

粗淺地說，工業化過程，是自一七六〇年代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之後，首先在英國展開的。由於係出自「自發性的開展」，因此英國的工業化過程可說是一種有機性的發展，企業活動在自由市場的機能下自由地運作，國家的監督與控制減至最低限度。因此，英國工業化過程的特色——它的漸進性，它的無計劃性，它的私有性，以及它濃厚的本土性——幾乎是歷史上的一個特例，我們在其他國家絕難看到類似的情形。在其他地方，大體上說來，工業化皆係一種「輸入」，不是由上層階級強行加諸於社會，便是由現行社會結構之外的集團引進社會的。

而相形之下，歐陸國家的工業化大體上是由國家所推動的，雖然各國在程度上各有不同。此可由歐陸各國在進行工業化時，皆由政府協助引進英國的技術人員，與技能工、籌措投資資金、提供貸款、創立產業、興辦學校、推動技術訓練、成立科技研究機構……等看出來。法國工業化的開路先鋒乃是金融機構，因此法國的金融機構通常兼營生產事業。而德國工業化的主要推動者並非商業的中產階級，而是普魯士的領導階級——普魯士的年輕貴族（Junkers）。類此工業化

型態，可稱為「強迫性的工業化」。而日本的工業化，則是在明治天皇的象徵性領袖下，由一部份的舊封建地主階級所推動的。

此外，自一八八〇年代以後，俄國亦積極從事於迅速而密集的工業化計劃，沙皇政權全力引進外國資本與外國技術援助，但在本地完全欠缺實業家階級、妥當的放款機構，以及技術性與紀律化的工作力的情況，工業化基礎過於薄弱，反而把沙皇政權拖垮。在共黨政權成立後，共產主義為工業化創立了一套新模式。在史達林的民主政策下，俄國的工業化係由一個革命羣體黨所領導，此種工業化的中堅份子，是其生力軍則是農人。在這種工業化過程中，農人不是注定要消失，便是徹底附屬於新創立的無產階級。俄國的工業化模式，為其後急於迅速工業化的落後農業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經驗——在本土欠缺任何社會力的情況下，亦可進行工業的發展。

工業化的不斷推進，使人類愈來愈形脫離其過去的懷抱，舊的農業社會秩序，漸為新的工業社會秩序所取代，人類的生活型態引起了空前的轉變，而社會的階級結構亦掀起了空前的「大翻轉」——新興企業資本家一躍而為社會的新統治階級，而廣大羣衆却淪為形同商品，或甚至比商品不如的無產階級。這種社會結構的「大翻轉」，促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本質，從事結構性的分析。分析的結果使他確認，生產的「公力化」與分配的「私利化」之間的矛盾，及其相應產生的：下層建築——工業化生產方式，與其上層建築——私有財產制度之間的無法配對，乃是導致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不穩與不公的主因。自此，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模式，開始面臨到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挑戰。

工業化是一種全球性的擴展過程。在歐美等工業先進國家彼此之間，由於工業發展程度差距不大，因此彼此間的交往並不致對對方構成重大的威脅。但是，一旦此種工業化的強制力，探入其他未有任何工業基礎的落伍農業地區時，它勢必對當地帶來重大的「衝擊」，甚至危及其社會的穩定。

由於自身的社會穩定遭受挑戰，落後地區對工業化的「侵入」，往往深具敵意，而此種敵意每易激起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此種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在現實困境上又苦無出路之餘，落後國家往往乞靈於人世間的現有彌賽亞——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圖開創新格局，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照妖鏡——不僅能助使它們「識破」它們本身所敵視的西方社會的矛盾與弱點，同時亦能為它們指示一條——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模式的新途徑。如此一來，落後地區的民族主義便很容易地結合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

特別是由於蘇聯新經驗的影響，它們往往堅信，它們必可自力更生，或甚至「關起門來」自求發展。而此種新發展模式的計劃性、集體性、均穩性……公平性，以及高度的集權性，與乎目標的明確性，更能使它們的排外傾向、傳統文化，及民族情緒獲致相當程度的安全感。於是乎，國際革命乃揭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

工業化雖然是自發性地首先在英國展開（荷蘭亦可算是工業化的發源地，雖然其程度與規模不及英國），但是它絕不是一種「突變」。不錯，工業革命使人類「斷絕」於其前工業時代，但是工業革命本身却是西方自十一世紀初以來，「多面化」文化趨勢經過源遠流長的互動作用，而迸現出來的產物。無可否認，中古世紀僧院教士在「黑暗時代」裏孜孜研究、摸索出來的「科學